

梵語成爲印度佛教 經典語言之探討*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黃柏棋

摘要

這篇文章主要探討梵語成爲印度佛教經典語之種種意涵。文中明白指出梵語成爲佛典語雖是違背佛陀最初的語言政策，卻是佛教僧眾經過一番考量之後的最終抉擇，而中間經過相當時間的演變過程。本文先從佛陀對於佛言與傳播佛法的關係談起，再論佛教

*2012/10/2 收稿，2013/1/5 通過審稿。

* 這篇文章原以英文“*The Problem of Sanskrit as the Canonical Language in Buddhism.*”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辦，2011年8月於無錫召開的「海峽兩岸首屆漢藏佛教會議」。改寫成中文的過程中，特別要感謝林俞君所作的翻譯。在此同時也要感謝兩位評審所提之意見。的確，以這麼短的篇幅裡要處理複雜而牽涉甚廣的佛教語言問題，不免有簡化之嫌，特別是有關巴利語問題的相關性，需要更爲小心的處理。不過，拙作意在對印度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提出可能的思考方向，旨在處理沙門與婆羅門文化的思想交鋒，而非探討佛教與印度教權力鬥爭之事。誠然，就梵語而言，吠陀梵語跟古典梵語的文化脈絡大異其趣，必須加以區別。然而，就思想意義而言，佛陀對於婆羅門語言所代表的文化主導權(或者說霸權)是懷有深刻疑慮的。準此而言，耆那教的語言史提供了一個絕佳之參照點，讓吾人更爲清楚地看出後期印度佛教在經典語使用上所面臨的困難抉擇。

語言之變遷及最終加入梵語大都會所涉及的一些問題。又，透過同爲沙門傳承的耆那教對語言之使用當爲參照對象，凸顯梵語作爲經典語的出現對佛教所產生之深遠影響。

關鍵詞:

佛言、梵語、方言、耆那教。

前言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語言和佛法傳佈之間的關係。這個議題和佛教在印度次大陸以及其他亞洲地區的發展息息相關。基本上，宗教經典語言的使用可視為一種有意識的選擇，而這種選擇與其相關之思想史發展背景是無法切割的。因此，佛教語言的問題與印度思想史的整體脈絡關聯密切。在這篇文章裡，筆者以 Lamotte 關於印度佛教的大作《印度佛教史》(Lamotte, 1988)，以及 Dundas 所論述耆那教在此一問題上的看法(Dundas, 1996)作為主要的參考資料，探討佛教最終張開雙臂，加入梵語國際大都會(Sanskrit Cosmopolis)¹所隱含的意義。

¹ 這是 Sheldon Pollock 所提出的一個文化霸權觀念。在其 2006 年所出版的鉅著：《人世間之神語：在前現代印度之梵語、文化與權力》(*The Language of the Gods in the World of Men: Sanskrit, Culture, and Power in Premodern India*, 2006)，Pollock 針對梵語古典詩所代表的政治意涵提出一個宏觀的看法，認為印度古典詩出現所體現的書面文化(literary culture)乃為印度文化政治力之展現，而將公元第一個千年受到梵語文化影響的亞洲梵語圈定為「梵語國際大都會」(Sanskrit Cosmopolis)。Pollock 認為梵語國際大都會所突顯的意義乃是以梵語宮廷詩(*kāvya*)及其姊妹詩體讚銘(*prasasti*)為代表的書面文化在亞洲各地王朝流行所展現出之跨國政治勢力。他認為梵語宮廷詩之崛起與傳佈，象徵印度王權(*rājya*)在亞州的擴張，文化權力的具體表現。然而，現存最早的梵語宮廷詩為馬鳴(Aśvaghōṣa)的《佛所行讚》(*Buddhacarita*)和《美難陀》(*Saundarananda*)，由此可見梵語國際大都會的複雜意義，以及印度佛教在梵語國際大都會上所扮演的不尋常角色。本文將梵語國際大都會的意義加以擴大，包括了所有以古典梵語寫成之書面文化。

在發展初期，佛教內部禁止使用婆羅門所使用的梵語(Brahmanical Sanskrit)。因此，印度各地方言²在佛教部派形成之後的幾個世紀間活躍盛行。然而，在佛教拒絕使用婆羅門的語言幾個世紀之後，梵語最後卻取代部派所使用的方言，成為印度佛教的經典語言。而一旦接受梵語成為其經典語言，佛陀的多元語言政策即被棄之如敝屣。佛教投身梵語世界是佛陀始料未及的，我們如何去理解這個在印度佛教史上所發生的重大轉變呢？

1.

整個故事的緣起要從佛言(*buddhavacana*)開始談起。在「巴利」律藏(*Vinayaṭīka*)和漢譯佛典的律部當中，吾人發現佛陀並不希望見到梵語成為佛典語言，而是鼓勵僧眾使用方言傳播佛法。吾人在「巴利」律藏中，即發現以下關於佛教語言政策之描述：

此時有兩位比丘，原為兄弟，姓耶彌盧諦拘羅，為婆羅門種，能說善言並為善語者，兩人來到世尊身邊，於禮敬世尊後，坐在一旁。坐定之後，向世尊如是說：「尊者，現在比丘不

² 方言(Prakrit)或通俗語是跟雅言或梵語(Saṃskṛta)區隔之中世印度雅安語(Middle Indo-Aryan Languages)。在此不妨參考 Woolner 所給的簡單說明：「中世印度雅利安語時期以巴利語和各種方言文學為代表。包括所有的方言，這些方言因語音上的改變以及一些文法上的變異情形因而形成一種明顯與古印度雅利安語不同的語言。這類語言可能到了十一世紀左右，又在語音上有了更進一步的改變而形成完全與舊文法相斷裂的新型語言。這種語言跟近代方言相類似。我們有關這個時期的知識必須從不同類別的紀錄——而這涉及到不同的所在地及時間——來拼湊出。這些紀錄包括碑銘及書面作品。最有名的碑銘為阿育王的敕令。而文獻則包括南傳或小乘佛教的巴利正典、耆那教的通俗語正典、方言抒情詩、史詩、劇本及方言文法。」Woolner, 1975:1-2。

同名，不同姓，不同種姓，不同家族，皆為出家行者，用自己之言語玷污佛言。世尊，如今吾人該將佛語轉為雅語。佛陀世尊乃叱責說：「你們這些蠢者，怎說出這話...比丘們呀！不要把佛語轉成雅語。誰這麼做，就是犯了突吉羅 (*dukkaṭa* 惡作) 罪。比丘們呀！我准許你們以自己的言語學習佛語。」³

這段文章在翻譯上碰到兩個「屬於上座部的問題。」(參見 Brough, 1980: 36) 因為假如上座部沒對這兩個彼此關連的問題提出與眾不同的解釋，就完全不成問題。第一個是 *chandaso* (為 *chando* 之為格或屬格) 之解釋，另一個則是對於 *sakāya niruttiyā* (為 *sakā nirutti* 之具格) 之理解。很顯然地，佛陀針將這兩種語言做了對比。從文脈來看，就像佛音所說，*chandaso* 在此的意思應該是指 (早期或吠陀時期) 梵語 (“*vedaṃ viya sakkatabhāsāya vācanāmaggaṃ*” : 「受人尊敬的語言之頌讀方式，如吠陀。」 *Samantapāsādikā*, 6: 12-14)⁴。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

³ *tena kho pana samayena yameḷutekulā nāma bhikkhū bhātikā honti brāhmaṇajātikā kalyāṇavācā kalyāṇavākkaraṇā. Te yena bhagavā te' upasakamiṃsu, upasaṃkamitvā bhagavantaṃ abhivādetvā ekamantaṃ nisidiṃsu, ekamantaṃ nisinnā kho te bhikkhū bhagavantaṃ etad avocuṃ; etarahi bhante bhikkhū nānānāmā nānāgottā nānājacca nānākulā pabbajitā, te sakāya niruttiyā buddhavacanaṃ dūseni. Handa mayaṃ bhante buddhavacanaṃ chandaso āropemā 'ti. viḡarahi buddho bhagavā. kathaṃ hi nāma tumhe moghapurisā evaṃ vakkhatha... na bhikkhave buddhavacanaṃ chandaso āropetabhaṃ yo āropeyya, āpatti dukkaṭassa. anujānāmi bhikkhave sakāya niruttiyā buddhavacanaṃ pariyāpuṇitun ti. Vinayapitakaṃ, 2: 139.*

⁴佛音(Buddhaghosa) 在此對於 *sakā nirutti* 所作的注釋涉及上座部佛教的語言

sakā nirutti 就是相對於婆羅門所使用的純淨語之其他各地語言 (而非佛音所講的是:「佛陀所講的像摩揭陀之屬的言語。*Ettha sakā nirutti nāma sammāsambuddena vuttappakāra Māgadhikavohāro. Sammantapāsādikā: 6:12-14*」), 也就是指方言的意思。

與上面引文最為接近之漢譯有兩處，文字如下：

時有比丘字勇猛，婆羅門出家，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卻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此諸比丘眾姓出家，名字亦異，破佛經義。願世尊聽我等以世間好言論修理佛經。」佛言：「汝等癡人。此乃是毀損。以外道言論而欲雜糅佛經。」佛言：「聽隨國俗言音所解，誦習佛經。」《四分律》(法藏部) 卷五十二；《大藏經》，22: 955a.

有二婆羅門比丘，一字烏嗟呵，二字散摩陀。往到佛所，白世尊言：「佛弟子中，有種種性，種種國土人，種種郡縣人，言音不同，語既不正，皆壞佛正義。唯願世尊聽我等依闡陀至持論，撰集佛經，次比文句，使言音辯了，義亦得顯。」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與美言為是。但使義理不失，是吾意也。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毗尼母經》(部派不明) 卷四；《大藏經》，24: 822a.

從上面援引律藏之例，不管是「巴利」或是漢譯，都讓吾人

觀與經典觀。對此問題請參閱拙作「上座部佛教之正統觀與語言關」，收錄於《從聖典到教史－巴利佛教的思想交涉》頁 146-176。以上之論述部分取自於此篇文章。

清楚地見到佛陀之語言政策。文中明白道出以吠陀梵語來傳布佛言是違反律規之事。這是一件十分明確之規定，佛陀要求其弟子嚴格遵循，違規之僧眾得受懲罰。在此，佛陀所作之決定是一新而艱鉅之舉。他公開挑戰體現於吠陀梵文上面所代表之婆羅門權威。不過，佛陀之堅持在其時代並非為唯一之例外，因為耆那教等亦有類似之舉。而證之於歷史，耆那教使用通俗語或各地方言之事，比佛教要來的更持之以恆。Paul Dundas 提出如下有關耆那教語言之使用的看法：

吾人可將耆那教在其開始八百零年左右完全使用方言的情況，看成是一種於意識型態上有意識地反婆羅門的立場，或者以更為現實的觀點視之，則宗教反映了所立足的文化環境。若把方言當成總括性名稱的話，當為書寫工具，在某段時間，方言於名聲上足以跟梵語鼎足而立。(Dundas, 1996:146)

上面引文清楚地顯示出耆那教並不認為梵語優於方言。耆那教有意識地使用各種不同語言，特別是印度各地方言來傳承經藏。(Dundas, 1996: 140ff) 其對語言的使用態度是相當清楚而果斷的。而佛陀的態度也同樣地不含糊：要另起爐灶，跟婆羅門所象徵之經典權威與思想正統互別苗頭。佛教想成為獨樹一幟之印度沙門傳承，勢必得要與婆羅門思想及其所樹立之價值觀和權威相抗衡。因此，從一開始，佛陀便極為明確地指出，其所開啓之法傳，教法之廣布要比維持言語之純正來得重要。事實上，也唯有與婆羅門在語言、思想上清楚區隔，方能彰顯佛教當為一新而獨特宗教傳承之特色。從更為宏觀之角度來看，初期佛教革退梵

語一事，正如同 Pollock 所言，乃是對於「吠陀思想世界之抗拒。」(Pollock, 2006:51-53)總之，由以上之引文，可以看出佛陀之所以排拒梵語，並非是一時興起，乃是有其重要考量，經過長時間考量後之抉擇。

2.

如果佛陀的語言政策是很明確的，那麼我們該如何去理解後來的佛教僧眾(可能始於說一切有部?)接受梵語這種體現婆羅門思想世界與價值觀的言語呢？在堅持了數百年之後，佛教僧眾放棄了方言，而改以梵語作為他們的經典語言。對於這種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吾人如何找到合理的解釋來作說明呢？於此，我們不能忽略佛教語言的發展脈絡。很顯然地，Lamotte 知道此一問題之嚴重性與困難處，所以他深入地做了一番探究。(Lamotte, 1988: 549-593) 他先從部派來檢視這個問題：

部派佛教的主要成就之一，在於將佛陀所說的話轉譯為方言。為了使佛法廣為傳佈，各部派抱持著開放、自由的態度，不帶有任何語言的偏見，盡可能地以各種語言弘揚釋迦牟尼的教法。在梵語還屬於菁英語言的古老時代，佛教徒傾向於使用中世印度方言(Prākritis)。但之後，當梵語這種「洗鍊的語言」變得越來越普及化時，他們則以方言為原型，越來越多地使用精準變化的梵語。(Lamotte, 1988: 549)

Lamotte 並沒有使用「正典」(canonical) 或是「經典」(scriptural)語言來敘述佛教複雜的語言狀況。他是一位十分博學的佛教語言學家，也因此深知佛教的語言問題牽涉甚廣。對他來

說，佛教語言的多元性或方言主義基本上是部派發展的結果，而且這和佛陀的多元語言政策相當有關。如果佛教確實從一開始就採取多元語言政策的話，那麼在佛教世界裡所使用的任何一種語言都算是經典語言。果真如此，吾人可能會認為根本就沒有什麼所謂的佛教經典語言這回事。事實上，在佛教裡，語言可能只是一種方便法門 (*upāya*)，亦即傳佈佛法權宜使用之工具而已。

Lamotte 強調佛教在語言使用上的彈性，指出這種流動性和時空因素相當有關。例如，梵語原本並沒有被考慮加以使用，但之後在整體環境改變時，即被拿來當成經典語言。而就佛教語言而言，在梵語發展至成熟的古典梵語(Classical Sanskrit)之前，有個所謂「混合梵語(Hybrid Sanskrit 或 Mixed Sanskrit)」的過渡時期。總而言之，一旦時機成熟，佛教僧眾便採用梵語為其經典語言：

梵語的知識持續在不同階層的人士之中傳播，且其用法的精確也使得梵語成為了傳播教法和觀念的理想工具。梵語曾是少數菁英所專用語言，但是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所以，佛陀決定使用各地方言的理由不復存在，佛教僧眾對於將佛語轉為梵語也不再有任何顧忌。(Lamotte, 1988: 584)

這種以梵語為中心的敘述觀點在歷史上可能是站不住腳的。用法的精確就足以讓僧眾採用梵語作為經典語言嗎？事實上，在佛陀決定棄梵語而以方言來弘法之時，語言的精準與否並非他主要的考量。正如同先前提到的，佛教因其語言政策而成為不同於婆羅門的沙門宗教。將佛陀的教法以梵語傳布等同於放棄

甚或背叛佛陀的教示與規定。因之，在佛教僧眾開始將佛言轉為梵語時，內心必定經過了一番的掙扎。的確，如前所提，在佛教的語言歷史中，全面使用梵語之前還有一段混合梵語的時期。(Lamotte, 1988: 574-583) 但是使用「佛教混合梵語」、「佛教梵語」或是「混合梵語」來描述特別為佛教所使用的一種特別梵語，並將之視為與婆羅門所用之梵語或是古典梵語截然不同的語言變體，卻是一種誤導。在梵語的譜系中，混合梵語的確是可以被區劃出來的一類。但事實上，所謂的「佛教混合梵語」還沒有足夠的條件，成為有別於梵語而獨立出來的一種語言。Pollock 指出，佛教混合梵語是「一種特別語法，與其說是尚未能完全掌握梵語，還不如說是尚在抗拒全面使用梵語。」⁵(Pollock, 2006: 56)

在這裡，問題的關鍵所在可能已經不只是語言的問題，還有對抗婆羅門的沙門傳統立場。僧眾對佛陀所鄭重立下的語言規範應該敬謹地加以遵守。就此而言，耆那教與佛教成了一個明顯的對比。雖然耆那僧團最後為了吸引婆羅門知識分子改宗，而允許使用梵語，但僧眾從來就沒有終止使用方言。對耆那教出家眾來說，方言並非為不如梵語的次等語言。正如同 Dundas 所說的，使用梵語與否在耆那教內部一直都不是個全面性的議題：

我認為就其所代表的意義，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來說，耆那教使用梵語幾乎都是地區性的個別現象。而

⁵所謂「佛教混和梵語」即使保留了一些中世印度語的文法特點，但梵語化的情形已經非常顯著。編寫《佛教混和梵語詞典》的 Edgerton 也承認說：「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現在吾人所知的佛教混和梵語這個傳承從一開始便廣泛受到梵語的影響，且隨著時間而增加。」(Edgerton, 1953: 1)

我們在討論的是較具全面性的議題，因此，耆那教並沒跟這個問題有重要的關聯。這也是耆那教對於梵語在整個印度古代和中世的歷史之中所扮演全面性文化角色的回應方式。(Dundas, 1996: 138。)

然而，梵語化(Sanskritization)與否卻成為了印度佛教所遭逢的普遍問題。而在大乘佛教完全以梵語來書寫經典之後，佛教步入了最為一個關鍵性的轉捩點。使用婆羅門的語言顯然讓佛教面臨極大的挑戰，因為他們必須要遵守對手——婆羅門的語言遊戲規則。而且，語言使用的改變所帶來的影響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為一旦開始，便沒有回頭的可能，而佛教的知識宇宙也會跟著梵語的論述方式而產生深刻的轉變。況且，如此一來，佛教僧眾就必須用他們當初拒絕的語言來與婆羅門勁敵競爭。而讓問題更發引起論議的是，他們是在婆羅門的勢力範圍來陳述論說、辯護佛法。到最後，我們可以說印度佛教終究隨著梵語國際大都會的到來而臣服於梵語了嗎？

3.

從印度語言的歷史來看，方言在古典梵語時代之前活躍了數百年之久。也就是說，梵語並不是從吠陀時期開始便是一直坐擁優勢地位，而是後來經過一番改頭換面，成為古典梵語才佔領了印度書寫史的。根據 Pollock 之說法，梵語國際大都會大約是在西元三百年左右奠定的。(Pollock, 1996, 2006) 而在這之前，是方言或中世印度語、中世印度雅利安語(Prakrit or Middle Indic, or Middle Indo-Aryan) 的天下。(參考 Lamotte, 1988: 549-573; Jamison, 2007:143-148; Salomon, 1992) 這同時也是以耆那教、佛

教和其他外道為主導的沙門時代。在當時，語言不僅與宗教的關係密不可分，同時也是一股強大的思想動力，創造出挑戰婆羅門正統思想與社會階級制度的新知識力量。在方言活躍的時代，眾家公開地挑戰婆羅門的正統權威地位。在吠陀時期過後，這場與婆羅門的競爭，沙門宗教占了上風，贏得首勝。(參考 Jamison, 2007:142-146)。

在印度，語言使用的輪替情況可以清楚地從銘文裡看出來。現在學界普遍認為梵語是在西元前一世紀才開始被用之於銘文的。(Solomon, 1998: 86) 而在這之前的好幾個世紀，印度大部分地區的銘文都是使用方言。對此，Solomon 解釋道：

印度早期的銘文幾乎都是以方言寫成的，或更精確地說，是中世印度雅利安語。在西元前三到一世紀之間，銘文的確只以這些語文寫成，這樣的情況至少維持了有兩個世紀，在某些地區甚至更久。到了紀元初期，「混合方言」(mixed dialect) 或稱「碑銘混合梵語」(Epigraphical Hybrid Sanskrit, EHS) 和梵語才開始在銘文中出現。接下來的好幾個世紀裡，中世印度雅利安語、碑銘混合梵語和梵語同時都被使用。但後二者慢慢佔了上風。接下來，梵語又逐漸地取代了前二者……如此一來，方言便在西元四世紀初於北印度的銘文裡消失。又過了一個世紀，亦不復出現於南印度的銘文之中。(Solomon, 1998: 72。)

前述關於印度語言歷史的發展，和 Lamotte 所描述的佛教語言演變多少是符合的。Lamotte 也認為「佛教語言和碑銘梵語

的發展是相當接近的。」(Lamotte, 1988: 583) 從銘文的證據顯示，不管是使用方言或是梵語，語言的使用極有可能是一種有意的「政治」考量，因為語言的選擇顯示出統治者個人的偏好，所以從碑銘也能看見語言和權力之間的關係。不過，宗教團體在這背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當婆羅門的影響力式微，而沙門宗教獲得統治階層護持時，不僅佛法等教門興盛，方言也被廣泛地使用在碑銘上。阿育王(約西元前 268-233 年) 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印度各地所立的石柱敕令完全以方言寫成。Menon 檢視南印度帕拉瓦王朝(Pallavas, 約西元 574-871 年)在銘文上所使用之語言，也提出如下的看法：

帕拉瓦王朝初期使用方言為其官方語言，到了中期，方言被梵語取代。而王朝後期銘文所刻的，則是坦米爾語，加上梵語和由方言借出但已被同化或未遭同化的混合語文……因為耆那教使用方言為主，而婆羅門宗教以梵語為主。所以從帕拉瓦王朝的歷史來看，我們可以知道，其中有些統治者是耆那教徒。而在碑銘上使用方言和後來使用的梵語兩種語言，則顯現出王朝的宗教背景。(Menon: 1996:251, 斜體為筆者所加)

吠陀時代之後，遭逢沙門方言宗教文化之對抗，梵語之復興並取得文化領導權需要一段長時間的努力。吾人看到的第一步便是婆羅門逐步取得巽迦王朝(Sunga Dynasty, 約西元前 185-73 年)弗沙蜜多羅王(Puṣyamitra, 西元前 187-151 年)的支持，並對佛教徒等加以迫害。(Lamotte, 1988:351-360) 另一方面，在吸收沙門宗教的出世文化與思想之後，古老的婆羅門聖教終於全面地

更新，成為煥然一新的印度教。總而言之，由印度史詩與法論經典所帶動的新的梵語化過程不僅為印度教帶來了新動力，也讓沙門傳統面臨了相當大的挑戰。印度教以種姓法(*svadharma*)來與佛法面對面對決。(參閱 Olivelle, 2006; Fitzgerald, 2006) 所以，當印度教的種姓法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宗教型構之時——可能也正是混合梵語時期——印度教在語言和宗教上勢必也對佛教產生了深遠的衝擊。若說僧眾為了吸引更多的信眾和護法者，特別是統治階層，而最後決定使用梵語作為其經典語言，以便能與婆羅門在宗教戰線上分庭抗禮，如此所帶來在語言上所做改變之決定是可以理解的。Lamotte 作了如下的評論：

大乘佛教徒因其過度的神祕主義，不同的修行理想(成就佛果)和更高深的哲理觀點(法無我，*dharmanairātmya*)而反對傳統的佛教，所以毫不遲疑地推翻了之前在戒律與經典上的宗教實踐方式。他們不僅將其方廣經添加在舊有的經藏中，同時也是佛教內部首先將[純粹]梵語使用在佛經長行中。雖然偈頌的部分保留了混合梵語，但那無疑是為了教學上的緣故。因為經文通常先來一段做說明的長行，再接著一段精簡的偈頌重複其內容。偈頌部分使用混合語言較容易記憶，因為梵語有嚴格的語音及語型論上之規定，而混合語則相當類似當時所使用的方言。(Lamotte, 1988: 586)

Lamotte 在這裡明確地點出問題所在。他發現大乘佛教所代表的，不只是一般所知的宗教與哲學上之轉向，還有語言上的大

轉變。是語言、宗教和哲學三者共同促成了佛教內部的知識革命——大乘佛教。這樣的革命不可能在一夕之間就轉成。而且，改變舊有的宗教實踐也需要一段時間，正如同印度銘文所透露的歷史變化。相形之下，耆那教在語言與宗教實踐上並沒有發生如同佛教一般的轉向。Williams 也指出，在耆那教的教史裡並沒有發生如同大乘佛教的運動。(Williams, 1963: xix)而就其歷史而言，耆那教這一禁欲修行之宗教傳統，並沒有跟著時代潮流走，其思想發展與宗教實踐乃受到傳統主義之規範。

從佛教混合梵語到古典梵語的轉變應該是經過相當時間商議的結果，因為僧眾必須要謹慎地處理佛陀的語言政策。畢竟佛教的語言改變是十分徹底的：從口頭到書寫，從方言到混合梵語再到古典梵語。要清楚地看出佛教語言改變的全貌，一定要將婆羅門所帶來的挑戰做為吾人主要的思考方向。僧眾必須認真面對婆羅門使用的梵語乃事關知識權力。而為了讓佛法常住於世，僧眾恐怕得接受現實。這在佛教的歷史中，是個極度關鍵的發展階段。

4.

Lamotte 在檢視佛教梵語歷史的各個面向之後，最後則以歷史的必然性來為其觀察做出結論。對他來說，印度第一個以梵語所刻的重要碑文完成時，佛教內部發生的梵語化命運已是無法改變之結局：

在讚美盧陀羅達曼王(Rudradāman)的頌文刻在吉爾那爾(Girnār)的石碑上之際[西元 150 年]，梵語已成了印度次大陸佛教之至高無上語言。釋迦牟尼所有的追隨者不論是弘

法者、詩人、文學家或是哲學家，為了要頌揚師尊其人與思想，都使用了梵語。

梵語一旦取得了絕對的優勢，又加上世親、無著及其對手的才華，佛教內部使用梵語的情況在笈多王朝[約西元 320-550 年]時期越加明顯了。(Lamotte, 1988: 593)

盧陀羅達曼的吉爾那爾碑文是以宮廷詩體所寫成的讚銘(*praśasti*)。(參考 Pollock, 2006: 67-70) Pollock 認為這是梵語成為印度公眾政治文化的開端。在其著作中，Pollock 主要是從世俗的觀點——亦即宮廷詩和讚頌的角度——來檢視這篇梵語詩作。他並未特別將佛教的梵語文化考慮作為其論述之部分。然而，從文化上來說，宗教在印度思想傳統之地位中總是高於政治。吾人若對照中世印度教和佛教的梵語化情況，即可以知道其中情況。所以，與其說梵語是在宮廷詩裡所呈現出來的政治力量(*rājya*)，還不如說它是透過經藏與密續而傳達出來的宗教神威(*śakti*)，因為印度教和佛教都是打造梵語大都會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而宮廷文學亦有其深刻的宗教連結，這可以從梵語文學史中開頭的兩部宮廷詩——馬鳴的《佛所行讚》和《美難陀》——來見出。在這兩部梵語宮廷詩中，弘揚佛法仍是馬鳴最終的目的。(Saundarananda, 18: 63-64) 於此必須指出的是，並非梵語本身具有與生俱來的優勢，耆那教之語言使用便是最好的例子。但不可否認地，中世以降之印度思想圈是越來越受到梵語化的支配與影響了。

紀元之後，梵語再度興起並且取得文化領導權是印度思想史一個新的開始。而這個梵語國際大都會存在於印度次大陸及其他

的亞洲國家達千年之久。不過，在佛教的歷史上，梵語和上座部「巴利語」⁶中先後出現之事，常令人深感好奇。⁷ 在這之前，提出經典語言或根本語(*mūlabhāṣā*)這樣的陳述，可能是無法想像之事。但在這之後，經典語言在佛教裡卻好像成了順理成章之事。固然，牽動佛教命運的各種情況有其複雜意義；然而，在印度和斯里蘭卡所發生的放棄通俗語或地方方言之趨勢，實在需要更有系統地來加以探討。不過，這方面的問題已經超出本文目前的論述之外了。

結論

使用梵語以及「巴利語」對於佛教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同時也開啓了一個新的正典化過程，佛教進入其歷史的第二階段。大乘與上座部的佛教僧眾完全置佛陀所規定的語言政策於不顧。而關於經典梵語化之事，Brough 解釋道：

⁶ 這裡使用『所謂「巴利語」』，主要是因為「巴利」(Pali)本身並非意指某種語言，而是指與注釋(*aṭṭhakathā*)相區隔的「正文」或「文本」。其之所以變成「巴利經典語」，首先是 19 世紀西方學界的誤解，再加上「巴利辭典」的編撰推波助瀾而成。由正文或文本轉為經典語言，亦可看出東方主義者的學術影響。凡此種種，參見前引拙作「上座部佛教之正統觀與語言觀」一文。

⁷ 這種巧合不免令人感到好奇。但是 Lamotte 對此並沒有做更進一步的探討。(Lamotte, 1988: 584-585) 上座部對其用「巴利語」來作為經典語一事，自稱是想回到佛陀所使用的原始或根本語(*mūlabhāṣā*, 《大史》*Mahāvamsa*, 37:244)，來為其使用經典語一事辯護。這種企圖與梵語之使用在前提上是不同的。不過，兩者皆是想採用經典語言，而有意地放棄佛陀的語言政策。關於「巴利語」作為上座部佛教的經典語言，亦請參考前注所列之拙作。

更有可能的是，在不同的教團中，傳承經典的方式也不同.....將傳承下來的文獻轉譯成梵語需要一個更積極的目的。至少就說一切有部的經典來說，作者們有意地以梵語來書寫是無庸置疑的.....因為他們所有的努力就是為了要以象徵學問和地位的語言來呈現佛陀的教法。而其他經典梵語化的背後一定也有同樣的動機.....以古典梵語的標準來看，它們或多或少還有點差距，其中有時可歸咎於作者無法寫出標準的梵語.....但重點是，早期的佛教梵語哲學和文學作品.....幾乎都是以古典梵語寫成的；所以，有缺陷的梵語，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文獻本身的抗拒.....一個更加重要的因素則是這些文獻是屬於聖典特質，所以將其轉譯成梵語的譯者會盡可能地不做太多修改。(Brough, 1954: 368-369)

這樣的狀況也和耆那教不同，因為耆那教在正典化的過程之中並沒有放棄方言，而他們對於梵語的態度也與佛教徒截然不同。Dundas 解釋說：

將經典轉譯成梵語是應受責難的，不僅是因為這種語言和婆羅門階級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也因為梵語可能產生語音及語意上的混淆，而這會導致耆那教苦行教團內部的混亂。這樣的立場反映出在西元五世紀時，耆那教在最後一次編寫正典之前所產生的爭議.....早期註解半摩揭陀語(*Ardhamāgadhī*)經典的註釋書正是以方言所寫。但是，在西元五到八世紀之間，*cūṛṇi*

這種以長行所寫的註釋書卻顯現出越來越多的梵語化跡象，像是經常以梵語來為方言用詞作註解，以及隨處可以看到的梵語形式和詩句。(Dundas: 1996: 151)

這種以方言為主，梵語為輔的情形讓吾人見到耆那教語言政策後來並沒有像佛教僧團那樣做了徹底的改變。弔詭的是，耆那教在印度並沒有消失，只是活動限於次大陸一地。然而十二、三世紀之後，佛教在印度本土開始衰微，大乘佛教和上座部卻在其他亞洲地區蓬勃發展。這是不是因為出現了像梵語或「巴利語」這樣的經典語言之緣故？值得一提的是，有了梵語和「巴利語」作為大乘佛教和上座部之經典語言，佛教最後成為了擁有「巴利」和梵語藏經的世界宗教。吾人不免會問說，這是否為佛陀當初將佛法弘傳於世的初衷呢？

參考書目

- Bechert, H. 1980. "Introduction" of *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pp. 11-16.
- Between the Empires, Society in India 300BCE to 400CE*. Ed. Olivelle, P. 200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ugh, J. 1954. "The Language of the Buddhist Sanskrit Text."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the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6. No.2: 351-375.
1980. "Sakāya Niruttīyā: Cauld kale het." in *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35-42.

- Cūlavāṃsa, Being the More Recent Part of the Mahāvāṃsa*. Vols. 1&2. Ed. Geiger, W. Combined Reprint, 1980. Pali Text Society.
- Dundas, P. 1996 "Jain attitude towards the Sanskrit language." In *Ideology and Status of Sanskri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137-156.
- Edgerton, F. 1953.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1: Gramm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70.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Fitzgerald, J. 2006. 'Negotiating the Shape of "Scripture": New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Mahābhārata between Empires' in *Between the Empires, Society in India 300BCE to 400CE*: 257-286.
- Ideology and Status of Sanskri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Ed. by Jan E. B. Houben. 1996. Leiden: E. J. Brill.
- Jamison, S. 2007. *The Rig Veda between Two Worlds*. Paris: de Boccard.
- Johnston, E. H. 1928. *The Saundarananda of Aśvaghoṣa* (Sanskrit text), *The Saundarananda : or, Nanda the Fair* (Translation).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motte, É, 1988. *History of Buddhism: From the Origins to the Śaka Era*. Trans. by Sara Webb-Bo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 de Louvain-la-neuve.
- The Mahāvamsa*. 1908. Ed. Geiger, W. London: Pub. for the Pali Text Society by Frowde.
- Menon, A. 1996. "The Use of Sanskrit in South Indian Bilingual Royal Inscriptions: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ns Implications." in *Ideology and Status of Sanskrit: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248-263.
- Olivelle, P. 2006. "Exploration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Dharmaśāstra." in *Between the Empires, Society in India 300BCE to 400CE*:169-190.
- Pollock, S. 2006. *The Language of the Gods in the World of Men. Sanskrit, Culture, and Power in Premodern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lomon, R. 1998. *Indian Epigraphy: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 Prakrit, and the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mmantpāsādikā: Buddhaghosa's Commentary on the Vinayapiṭaka*. 1966-82. 8 vols. Eds. Takakusu J. and Nagai. M.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 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Ed. Bechert, H. 1980.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 Vinayapiṭakam*. 1881-83. 5 vols. Ed. Oldenberg, H. Repr. 1996. Oxford: Pali Text Society.

- Willams, R. 1963. *Jaina Yoga. A Survey of the Medieval Śrāvakācāra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olner, A. 1975. *Introduction to Prakrit*. Reprinted.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 黃柏棋，2009。《從聖典到教史－巴利佛教的思想交涉》台中:明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大正新修大藏經》，100 冊。東京:大藏出版社，1924-1934。

The Problem of Sanskrit as the Canonical Language in Buddhism

Huang, Pochi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rave implications of Indian Buddhist adoption of Sanskrit as the canonical language. While the use of Brahmanical Sanskrit openly violates the Buddha's language policy, it is a momentous yet conscious decision made by the Saṃgha. The lengthy process which leads to the embracing of Sanskrit needs to be pondered upon. Start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ddhavacana and the dissimilation of dhamma, this essay investigates the history which leads to the final resolution of using Sanskrit to propagate dharma. Using Jaina history of scriptural languages as a reference point, it tries to bring out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Sanskrit as the canonical language after the Mahayana Buddhism.

Key words: Buddhavacana, Sanskrit, Prakrit, Janism.